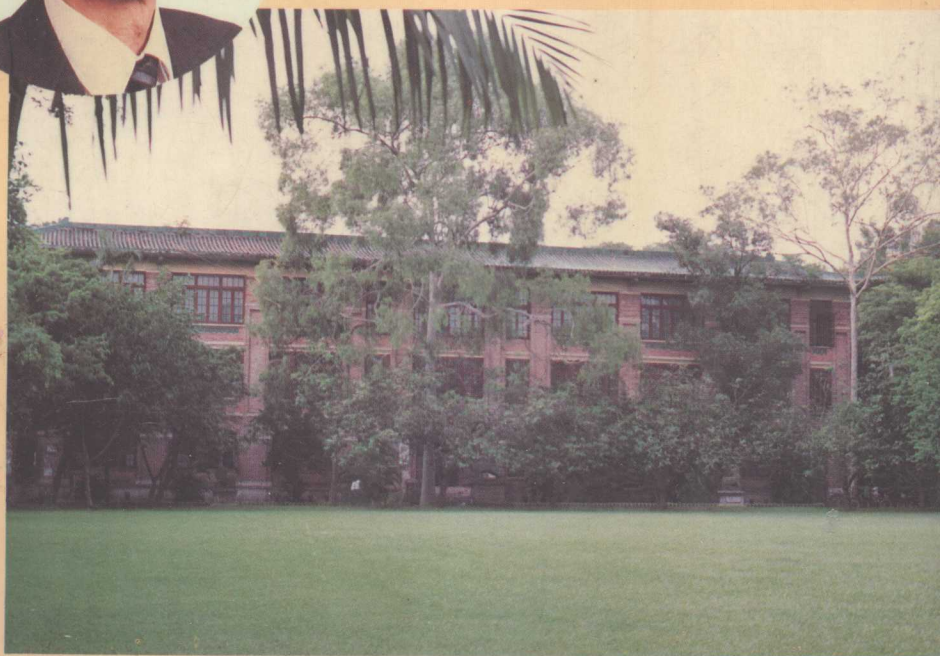


梁釗韜與人類學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

梁劍韜與人類學

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社 編



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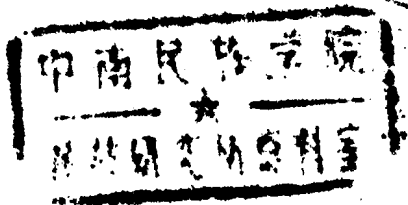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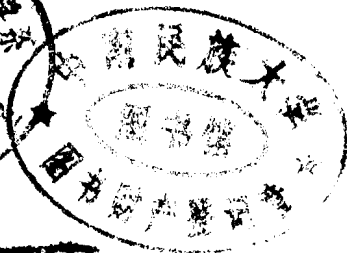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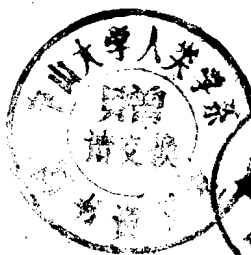
0903191

保存

000075

梁钊韬与人类学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0903191

梁钊韬与人类学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

责任编辑:梁之 封面设计:钟山
责任校对:龚富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字数 25万字

1991年11月 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册

*

登记证号(粤)第11号

ISBN7-306-00432-8/C.16

定价:8.00元

目 录

梁钊韬教授生平业绩·····	庄益群 (1)
梁钊韬教授学术思想研究·····	陈启新 (17)
梁钊韬先生的主要成就·····	曾昭璇 (43)
怀念梁钊韬先生	
缅怀梁钊韬先生·····	吴汝康 (59)
我的良师益友·····	麦英豪 (62)
梁钊韬复办人类学系·····	(美)顾定国 (67)
一定要把人类学系办好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十周年回顾·····	陈梓权 (73)
中国人类学源流探溯·····	黄淑婷 (87)
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	
人类学的贡献·····	张寿祺 (112)
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杨成志 (135)
梁钊韬先生与我的民族考古研究·····	格 勒 (140)
体质人类学在人类学中的作用·····	黄新美 (152)
语言学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	宋长栋 (162)
论考古学在人类学中的地位·····	李秀国 (181)
梁钊韬教授与西樵山考古·····	曾 骥 (203)
略论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之学	
习与扬弃·····	龚佩华 (225)

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发展趋向的探讨·····	乔晓勤(235)
人类学应用种种·····	陈 华(252)
人种、种族及人类的分类 ·····	容观复(258)
论“禹步”的起源及禹与巫、道的关系 ·····	刘昭瑞(264)
我国民族源流宏观系属初探·····	杨鹤书(280)
中国人类学近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李安民 麻国庆(302)

封面说明:梁钊韬教授像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楼

LIANG ZHAO TAO AND ANTHROPOLOGY

Contents

- 1) Professor Liang Zhao Tao's life story
Zhuang Yi Qun(1)
- 2) A study on the academic thought of Professor Liang Zhao Tao
Chen Qi Xin(17)
- 3)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Professor Liang Zhao Tao
Zeng Zhao Xuan(43)
- 4) Cherish the memory of Professor Liang Zhao Tao
Wu Ru Kang(59)
- 5) My good teacher and helpful friend
Mai Yin Hao(62)
- 6) Liang Zhao Tao and the rebirth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in Zhongshan University (ZSU)
G • Guldin (USA)(67)
- 7)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in ZSU in the last decade
Chen Zi Quan(73)
- 8) The approach to the origin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Huang Shu Pin(87)
- 9) Chinese anthropology in its early years and contributions of ZSU to Anthropology
Zhang Shou Qi(112)
- 10)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in ZSU and I
Yang Cheng Zhi(135)
- 11) Professor Liang Zhao Tao and my research on Ethnoarchaeology
Ge Le(140)
- 12) The role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in Anthropology
Huang Xin Mei(152)

展开了学术讨论。在讨论会上,以考古教研组名义提出《广东原始社会的探讨》论文。该文对广东历史的开端,马坝人时代的社会性质,西樵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广东原始社会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和原始社会解体及向封建制过渡等重大问题,均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诸如认为西樵山遗址所发现的大批石器,“按其性质,一部分是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工具;另一部分中的一种是明显地保存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而早于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还有一种是不属于旧、新石器类型的,这两种石器可能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1958年,梁钊韬教授曾组织历史系师生调查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分布地点共九处之多,并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了国内考古学界的瞩目。五十年代以来,西樵山一直成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人类学系师生实习和科研的基地,并发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不同类型的细石器,从而也吸引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可见,西樵山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实得力于梁钊韬教授和中山大学师生。梁先生的上述论文,确是科学理论与丰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体现。关于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梁钊韬教授运用考古学区域文化比较的方法,统揽整体,纵横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愈接近中原或愈靠北边的地方则结束愈早,其下限年代也愈早。南京阴阳营遗址的第四层文化,应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人们共同在中原争逐大平原发展着农业;到了第三层时,应和中原的商代同时,可能受中原铜器技术的影响进入青铜时代。”并指出粤东及广州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下限及于西汉。同时,他还指出,“印纹硬陶”只是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此外还另有一种文化特征,即夹砂素面陶和细泥质的彩陶及少量黑陶。他还论证了中原文化对海南地区由环海地带逐步向腹地五指山的呈现层次的影响,如今结合民族学资料看,这已是一种不可抹煞的历史事实。

(二)对民族史的研究

梁钊韬教授除着力于史前史的研究外,对民族史的研究也相当注重。他先后撰写过《我国少数民族的族源、迁徙与融合》(1975年7月在编写《简明中国通史》古代部分学习班的讲演稿)、《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与混血》(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经济学系的演讲稿)、《西瓯族源初探》(载广东《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濮”与船棺葬关系管见》(载云南《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虽然大都侧重于对南方民族的源流及彼此的关系的探究,但也贯穿着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从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科学角度作综合研究的宝贵的学术思想。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他勾画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方向和原因,指出:“从农村公社时期开始,人类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不同的氏族和部落按地域关系杂居在一块地方共同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按照这种循环式的外婚制度,不同氏族和不同部落的人,互相混血、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杂居越扩大,血统混合也越广,民族也越发扩大。”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促进民族发展扩大的一个原因。”因此,他强调族系的研究,认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历史和现状如何复杂,只要能掌握他们的族系,则对我们研究民族史是会有有一定的帮助的。”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语)的历史与现状看,梁钊韬教授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梁钊韬教授关于民族史方面的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瓯族源初探》一文。他在此文中,引证了中外丰富的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说是其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的代表

生作过关于民族学研究的谈话,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是发展的,我觉得这门学科很重要,我们要大批的人,从事这项工作,”“对资产阶级民族学要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批判也不是全部否定。”^②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列入国家的《1956—1967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和《中国科学院规划任务书》中。但是民族学究竟应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人们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有的说是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或作为历史学的注脚;有的说是研究民族的学科,通过实地调查提供资料供党政部门参考。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认为,不必拘泥于学科名称,重要的是进行实际的工作。这个看法在当时来说是积极的。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们怀着极大的热忱,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家迫切需要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五十年代对少数民族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一是民族识别调查,二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识别是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确定我国有哪些民族成分,这是为了保障各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工作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省区政府的领导下,集中在 1953—1956 年进行,以后继续解决遗留问题。中央民委曾多次派遣、有关各省区也组织由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工作者组成的民族识别调查组,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和语言学家傅懋勤、严学窘等都亲自率队在贵州、云南、广东、内蒙古等地进行调查研究。经充分调查研究之后,提出报告,并征求有关民族上层、代表人物和群众的意见,最后由国务院确定哪一个民族是单一民族,并予以公布。我国目前的 55 个少数民族,除了历来被公认的以外,有 40 多个民族是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后才明确成分的。在这样大的范围中进行族体的识别

研究,是世界民族研究史上的壮举。人类学家们承担国家交给的任务,调查研究的结果直接提供政府作为决策的依据,这使他们体验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是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问题服务的,是有价值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出发,在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进行了理论和事实的反复检验之后,研究者们认为不能照套四个特征。他们对族体存在状况进行研究分析,认识到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特点构成民族的主要特征,并由此而产生共同的民族自我意识。他们充分考虑到斯大林关于“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民族要素的论述,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理论,最后认为共同的文化特点是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从而以共同文化特点作为识别民族的最重要标准。^⑥

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抢救落后”的指示,由全国人大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规模比民族识别还大。通过这次调查研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各个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二是为各个少数民族编写简史简志。以社会性质研究来说,还在1954年甚至更早些时候,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区如云南和新疆等,为了准备将要进行的民主改革,就曾派遣调查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系统地调查社会历史、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等情况,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在这个基础上,1956—1958年,各省区先后组织了16个调查组开展调查研究,参加调查的有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工作者共达千人,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吴泽霖、杨堃、岑家梧、李有义、罗致平、江应樑、梁钊韬等,都成为调查组的领导者。有关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数百名参加了这次调查,有的在当地工作长达数年,成为日后和今天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专家和骨干力量。

这次调查实际上是第一次对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语言学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

宋长栋

梁钊韬教授已去世四年了，回忆他在去世前不久，躺在病床上还在讲语言学对人类研究的作用。从筹划复办人类学系开始，梁钊韬教授就经常谈到用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相结合的原则来研究人类学课题的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南方文化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中说：我国南方文化的两重性和多重性的历史关系异常复杂，所以西历近百年来任何一个人类学派或学说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吸收世界各个学派理论的优点和精华，联系中国的实际，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综合考察，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研究，才能逐步摸清我国南方文化发展的脉络，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①

从语源学上讲，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的科学。而语言既是人类用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交际工具，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而，以“人”为研究内容的人类学与语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使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是可以加深人类学的研究和扩大语言学的视野的。本文拟从语言学与人类学研究、研究方法、理论原则方面谈些个人看法，并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人类学研究,有不少问题要借助于语言学。我们谈三点:

语言与群体

从人类学的研究来说,必须回答人类群体语言的有关问题。例如:

语言的起源 语言起源问题是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语言,语言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相联系,就人类学来说,继续探讨语言起源问题,对于了解人类的起源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说:“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⑧劳动创造人,也创造了语言。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社会。恩格斯结合人类起源、人类社会起源的科学理论,对语言的起源的理论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

现在看来,恩格斯在上文中集中说明的是语言产生的各种条件,即语言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那么,语言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语言到底是从什么东西变来的?语言产生以前,人类祖先又是怎样交际的?^⑨限于当时其他科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能具体回答的。直到今天,科学家对这些问题也没有提出明确而又一致的见解。这还有待包括语言学在内的,与人类学有关各学科的综合研究。

语言与思维 语言是交际工具,也是思维工具。思维的过程都是在语言形式中进行的。“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

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④

语言与思维相互依存,彼此不能分离,但也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哲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都作了许多研究,不过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例如,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提出一种语言并不单是一个把我们的想法和需求变成声音的译码程序,相反,语言是一种成形的动力,它通过提供表达的习惯用法,预先安排好人们以某种方法观察世界,因而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⑤这就抛开了客观现实,使思维依从于语言形式,得出了语言决定思维、决定文化的错误结论,因而受到人们全面的批评。

其他如人类思维有什么共同规律,这些规律与语言规律有什么关系,词义与概念等,也是人类学所关心的。

语言系统 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系统是由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组成的。各语言系统互有差异,不与相同。以汉藏语系语言的语音系统为例。黎语保定话的语音系统由32个声母、99个韵母和6个声调构成;而汉语北京话只有声母22个、韵母35个、声调4个。广州话的语音系统也跟北京话不一样,它是由19个声母,52个韵母和9个声调构成的。一种语言虽然纷繁复杂,但都有其规律和特点。

解放后的民族识别工作,语言方面,就是靠有关语言系统的比较研究推断的。

语言是一个系统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为语言学家“一生受用不尽”^⑥。它的研究方法对其他社会科学都有影响,有的认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⑦例如,结构人类学就是把音位分析方法广泛运用于人类学研究的结果。

发展变化 现实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发展和变化中,语言也一样。语言的变化表现在语言系统各环节——语音、

编 后

梁钊韬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教育家，其学术著作颇丰，造诣良深，深入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亲自复办的人类学系，也已经历了十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为了进一步研究梁钊韬教授的学术思想，以及更好地总结人类学系的办学经验，以利于我国人类学科的繁荣和发展，特编辑本书。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梁教授夫人邓泽民教师的关怀，其内弟邓皋如先生及其子梁津博士（美国国际森林工业公司总裁）赞助出版经费。谨此致谢。

本书由黄淑婷、张寿祺、宋长栋、陈梓权、庄益群等同志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一年十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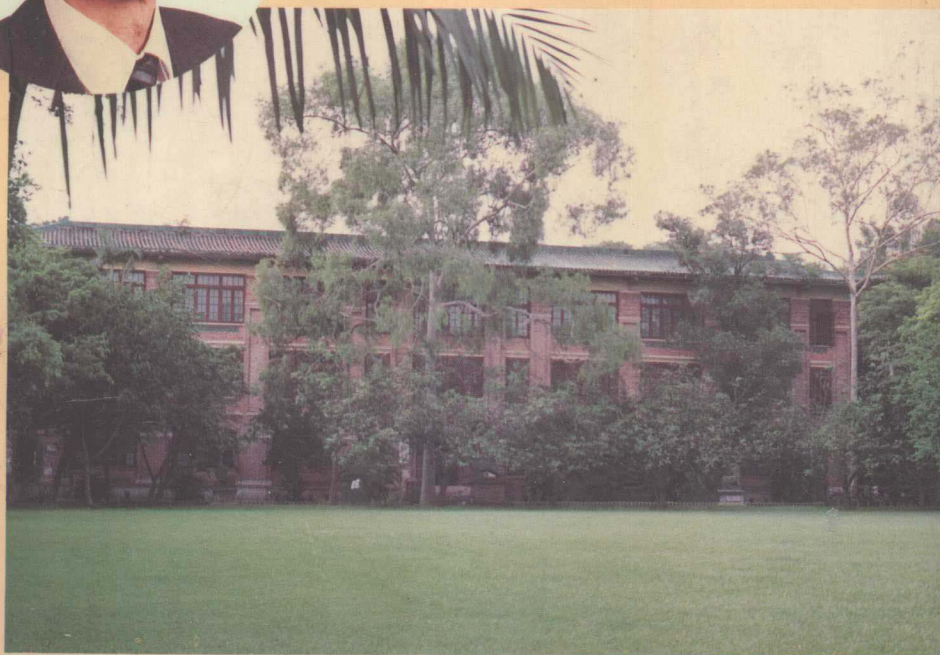
梁钊韬与人类学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梁釗韜與人類學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研究访问 www.ertongbook.com